

中国贸易开放战略 为何不利于劳动增收？

——兼论“Stolper - Samuelson”效应未在中国显现的原因

李卓 李智娟*

摘要：近二十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提升远不及国民收入增长的“奇迹”，在初次分配中占比渐趋下降。随着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进，出口规模扩大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劳动报酬受惠有限，背离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预期，尤其是在比较优势仍集中在劳动要素的情形下。本文主要检验中国外贸发展对劳动收入水平的净效应。在赶超发展的制度背景下，通过构造并使用不同的赶超程度指标，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所有制构成、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后，本文仍然发现对外贸易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结构利用并固化国内“资强劳弱”格局，吸收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抑制其报酬提升。长此以往，我国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停滞在国际分工低端环节，脱离顺应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的轨道。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 对外开放 赶超战略 资本偏向性政策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保障就业和促进工资增长重新成为关注焦点^①，只有兼顾速度与平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当前，中国正全面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同时特别强调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收入和工资水平也曾经经历上升和稳定阶段。而近二十年不断下落，与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累及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中国是否存在结构性失衡、能否实现“共富”理想成为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经久不衰的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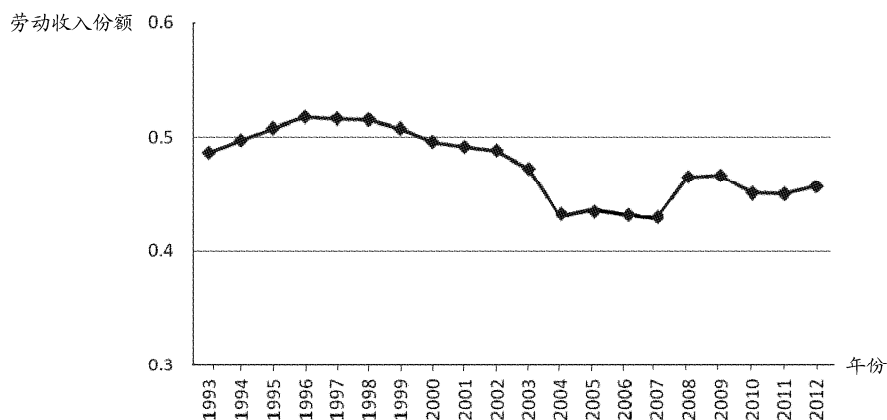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创造的国民收入并没有成比例地落入居民口袋，

*李卓，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lizhuo@whu.edu.cn；李智娟，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776931863@qq.com。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招标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研究”（项目编号：10JZD0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工业化中期阶段典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项目编号：11JJD790030）、武汉市软科学研究计划“武汉市产业递进和转型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04060601026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①劳动市场发展是经济基本面好转的可靠依据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2014年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官员们对就业及工资增长表达了担忧。

工资涨幅远不及经济增长速度,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地位下降是其主要原因。在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构成中,劳动收入占比由1993年的48.61%逐渐下降到2012年的45.59%(见图1),同时资本所得和政府税收收入占比逐渐上升,一定程度上呈现“资强劳弱”局面。而中国国内需求是工资领导型,劳动收入停滞不前最终会抑制消费,拖累经济增长(黄乾、魏下海,2010)。



注:资料来源于199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1 1993-2012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一旦出现结构性不公,借助税收及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只会事倍功半,带来大量无谓损失(社会净损失)。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同期发达国家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同美英等后工业化国家相差5~10个百分点^①。此外,纵向对比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1996年达到51.76%的高位后持续下降,目前处于历史低位(见图1)。即使排除2004-2007年统计口径缩窄的数据(期间自我雇佣所得计入资本收入),1993-2012年劳动份额仍整体下降3个百分点。分省际来看,无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多数省市近十几年里都经历了劳动份额的大幅下降^②。

改善劳动收入对我国当前发展至关重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党和政府列入重要议程。劳资分配悬殊不仅累及居民增收和幸福感提升,还会因为抑制消费需求而减少投资生产的动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遭遇瓶颈,阻碍经济向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变。

本文兼顾国内国际环境,以国内发展战略为背景,考察对外贸易战略对国内经济的作用。政策制度变迁对收入分配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较于西方国家,市场调节与经济计划结合得更为紧密,基本国策、发展方针指令明确。因此,系统地研究制度层面如何影响劳动收入所得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的技术特征为基础,兼顾国内外制度性因素,实证研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技术进步内生性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赶超发展战略的制度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尽管仍主要利用了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考虑到中国外向型经

^①具体数据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3年国际统计年鉴》,http://data.stats.gov.cn/lastestpub/gjnj/2013/indexch.htm。

^②下降趋势可参见199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济发展的技术进步并非内生于自身的要素禀赋,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并未显现基于比较优势的经典要素禀赋理论的预期效果,注重增长速度的赶超发展长期侵蚀着劳动报酬。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开放战略的确立过程,综述既有研究中的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引入各种代表性指标,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厘清各因素的净影响。最后,契合当前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平衡健康发展的需要,提出扭转政策偏向、顺应比较优势、可持续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背景、文献综述与理论逻辑

既有研究基本从两个方面寻找失衡来源,林毅夫(2002)、Du等(2013)从国内赶超发展战略出发对生产、分配、消费、出口各环节的失衡给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张莉等(2012)从外部环境出发寻找贸易条件等对国内经济的反馈机制。

(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发展方式和政策制度已发生明显转变(Cai and Wang, 2009; Bergsten, 2009; Rodrik, 2006, 2010; Anderson and Raimondo, 2008),随后的经济跃升、劳动收入趋势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经济制度变革。1994年初我国对内赶超发展、对外全面开放的战略格局基本确立,各省市面临的制度环境基本一致,为研究制度变迁的冲击效应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

1992年后我国强调加速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随之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责。GDP成为考核地方政绩的重要依据,随后设置的中央-地方分税制度进一步刺激地方经济“做大做强”。除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也作为“长期的政策”贯彻推进。国际交往日益深化,中国政府顺应世界经济形势,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发展方略^①。1993年对外开放城市已经遍布全国所有省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我国真正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94年,对外开放重心从引进来转向走出去——当时的外经贸部提出并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的角色定位从获得外汇收入变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为配合战略实施,政府开始实施出口累退税制,汇率经过改革长期锁定在较低水平^②,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1994年当年就彻底扭转了贸易收支赤字并在之后二十年保持顺差。然而贸易成就并未给劳动者带来同等的福祉,劳动收入占比反而逐年下降。

(二) 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和贸易开放深刻改变了要素收入在各国(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分配格局。根据国际贸易经典理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简称为SS定理),各国以要素禀赋确定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其相对丰裕要素的报酬会上升。经由贸易品价格趋于一致,要素价格也会逐渐均等化。实证研究表明,发达国家

^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对1979年以来循序渐进的开放实践成效予以肯定。

^②直到2004年、2005年,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下,我国才放松汇率波动幅度、大幅下调出口退税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两项政策再次成为重要调控手段。

的对外开放符合SS定理预期,反观硬币的另一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收入并未相应上升。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理应使得劳动报酬特别是非熟练工人报酬上升,其与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即技术溢价)缩小,提升劳动整体收入同时缩小劳资分配差距。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近三十年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压低了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劳动收入水平(Harrison, et al., 2004; Slaughter, 2007),违背了理论预期和政策愿景。

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但从价值链的增值环节来看,比较优势仍体现在廉价劳动力上。若只观察最终产品,我国出口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①,但诸多研究表明机电产品出口受传统劳动力优势驱动的因素仍很大(张乃丽、崔小秀, 2009; 陆春平, 2005; 林浩等, 2005)。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品中加工贸易也占了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及出口加工贸易构成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旧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殷功利, 2012)。

考虑贸易品种类变化的实际贸易条件存在微小改善^②,中国经济开放符合SS定理前提,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相比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及民族独立国家间(南北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近几十年的经济开放效应其实很难看清。一方面,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要素价格管控会因为“共振”(confounding)效应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细化,跨国贸易逐渐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在多个国家分担生产环节的贸易模式下各国的比较优势需要更细致地划分,剔除其他制度经济因素作用。^③

考虑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学者们给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解释众说纷纭。Helpman和Krugman(1985)认为,规模收益递增会使所有生产要素都得到好处,甚至包括一些稀缺要素。但该说法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的下降。Harrison等(2004)和Slaughter(2007)从世界市场“资强劳弱”的格局入手,认为全球化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性增强,弱化劳动谈判地位,恶化了劳动收入。还有一些学者归因于熟练劳动技术溢价提高给非熟练劳动工资带来的负外部性。当然这也可能是出口企业本身技术含量较高导致的(周明海等, 2010)。

具体来看,劳动收入不仅受贸易开放的影响,还受到发展战略、经济水平、资本深化、产业结构、市场自由度及技术进步等因素作用。它们不仅改变对劳动的吸收能力,而且还改变其单位报酬水平。

首先,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度对经济公平和效率影响巨大。顺应比较优势平衡发展还是集中资源进行赶超是宏观政策领域历久弥新的议题。中国在1992年后发展战略由平衡转向赶超,既奠定了增长“奇迹”的制度基础,也极可能因为全面干预了要素价格、要素边际替代率及产品价格而挤压了劳动收入。因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值高且便于征税(张全红, 2010),地方政府在政绩和税收收入激励下,争相为发展这类产业创造宽松低成本的投资环境,劳动成

^①2003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品总值中占比首次超过50%,并逐年攀升。

^②钱学锋等(2010)基于种类变化篮子的测算方法,发现1995-2004年间中国的实际贸易条件大约改善了1.36%。

^③Kris和Yan(2014)选择中国二十世纪头三十年的数据,即是因为要素禀赋模型足以解释当时贸易开放对一国工资的动态效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及其工资陡增,考虑当时不存在太多的差异化贸易品和产业内贸易,需要控制的干扰因素较少,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检验贸易骤然扩大与劳动收入的因果关系。

本和贷款利率常年保持在低水平(杨俊等,2010);同时为保障企业盈利通过一系列的税收、补贴政策^①抬高资本品价格。简言之,在初次分配中政策偏向即开始对资本要素进行收入让渡,诱导企业加大相对稀缺要素即资本的投入占比,从而增加资本分配占比,加速资本存量积累,结果容易倾轧劳动收入。

另外,根据既有的国别实证研究,劳动收入份额随着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而呈现U型形态(Kuznets Curve)。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体量的增长,还包含着结构的变迁。工业化不断推进,产业结构重心依次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速度慢于资本,带来劳动份额先降后升和资本份额先升后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二者才趋于稳定(李稻葵等,2009)。本文研究的时间范畴内,中国总体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201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省市仍处在劳动份额的下行区间。

其次,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水平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市场势力。不同于索洛增长模型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假定,技术进步既非外生也非要素中性,通常沿着节约稀缺昂贵要素的发展方向来改变要素配置比例。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技术进步通常用资本替代劳动,带来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Acemoglu,2003)。

市场化水平越高,劳动流动越顺畅,越有利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开端在部分领域放权让利,引进私营和外资企业。非国有经济占比体现市场自由程度,对要素收入分配可能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扩张劳动需求;另一方面,私营和外资企业没有促进就业的政策性职责,工会势力不占优甚至不存在,员工津贴及福利可能受到变相压榨。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发现国有化程度越低,劳动收入份额越低,故将工业部门劳动份额下降归结为国有企业改制和市场垄断势力增强。邵敏和黄玖立(2010)认为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工资水平产生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三)理论逻辑

综上所述,SS定理的预期似乎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的劳动报酬下降相左,但这并不表明在整个贸易开放、发展的过程中,SS定理所揭示的机制未发挥作用。即使是针对发达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有关研究表明,其单位资本报酬及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虽然符合SS定理预期,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涨幅之大似乎超出了贸易发展的影响效应(Katz and Murphy,1992;Krugman,1995;Berman and Griliches,1994;Borjas, et al.,1997)。随着研究的深入,已经有结果开始表明(如Acemoglu,2003),前述文献低估了贸易对要素收入的影响,关键的分野在于是否将基于经典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诱导的内生性技术进步综合考虑。为此,本文的研究逻辑与思路是:在测算贸易开放对要素收入的影响时,必须综合考虑各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技术选择特征,而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战略则进一步加剧了因技术选择而导致的“资强劳弱”的分配格局。

具体而言,一般均衡框架下^②,要素收入份额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要素市场势力、技术选择因素及要素禀赋。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贸易开放释放 Stolper -

^①在一些行业和企业里,差别化制度安排一直持续到2010年之后。

^②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有关的理论模型。

Samuelson 效应,但与此同时,要素禀赋特征与技术选择的互动关联性对要素收入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其结果是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 SS 效应被技术选择效应所湮没;而技术选择的影响则主要通过两种作用效果相反的机制显现:一是价格效应,即要素报酬与其稀缺度直接相关,通过正常的要素需求关系体现;二是所谓市场容量效应,即技术进步偏向于开发、衍生出与经济中相对丰裕要素相结合的技术组合,从而提高丰裕要素的边际产出、提升其要素报酬。发达国家内生于其要素禀赋优势、经由贸易开放引致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因此会增强、放大其在资本要素上的比较优势(Acemoglu,2002,2003)。然而,发展中国家在赶超思路下引进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的先进技术并非内生于要素禀赋,由此产生的技术偏向性影响就会湮没 SS 定理机制对劳动报酬改善的影响,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实现技术进步时应当慎重考虑的问题。

三、实证检验

(一) 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划分为劳动者报酬(居民部门)、生产税净额(政府部门)、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资本报酬,企业部门获得)。政府部门税收收入不断提高,为防止高估要素份额,计算时并未从分母 GDP 中扣减生产税净额。用 $Laborsh_{it}$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Capitalsh_{it}$ 表示资本收入份额,其余份额记为 $Govshare_{it}$,下标表示 i 省 t 年的数据,所有指标同理。

对外开放采用贸易开放度来体现,将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记为 $Open_{it}$ 。发展战略记为 $Strategy_{it}$,一般采用技术选择指数 TCI(technology choice index)来度量其资本偏向和赶超程度。TCI 定义为某一部门或产业 h 生产投入的资本劳动比(要素密集度)与整个经济体积累的资本劳动比(要素禀赋)的比率(林毅夫,2002)。

$$TCI = \frac{K_h/L_h}{K/L}$$

根据可得数据计算出高技术产业和工业的技术选择指数,分别记为 TCI^1 和 TCI^2 。前者等于人均高技术产业总值(高技术产业总值/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总就业人数)的比值,后者等于人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地方政府越偏向发展资本和技术产业,则 TCI 值就越大。因为一系列优惠政策通过降低投入成本和缴税负担并提高产品价格,提升高技术产业总值或工业增加值,同时抑制对劳动力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最终表现为 TCI 增大。

经济发展水平用实际人均 GDP 表示,记为 $Ragdp_{it}$ ^①。考虑收入分配公平性与其潜在的非线性关系(U型),加入平方项 $Ragdp_{it}^2$ 。产业结构或工业化进程用第二产业比重表示,将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记为 $Indus_{it}$ 。高技术水平 $Tech_{it}$ 用高技术产业年均从业人数表示,取对数后代表高技术进步速度。本文中的市场化水平 $Nonsoe_{it}$ 仅从所有制结构反映的市场自由度考虑,等于工业总产值中剔除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外的产值占比,体现非国有化水平。工业重化程度指工业企业总产值中的重工业企业总产值占比,将其记为 $Heavyindus_{it}$ 。进出口贸易额中高技术产品占比反映出口结构,记为 $Exbias_{it}$,取对数后反映出口结构变动。

①以 1994 年为基期,单位为万元人民币。

如前所述,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1994年正式确立并深化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因此选取1994-2012年27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①,各变量的统计摘要如表1所示。^②

变量	含义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i>Laborsh</i>	劳动收入份额	0.4941	0.0829	0.3145	0.7023	513
<i>Capitalsh</i>	资本收入份额	0.3656	0.0718	0.1703	0.5294	513
<i>Govshare</i>	政府收入占比	0.1430	0.0315	0.0643	0.2662	513
<i>TCI¹</i>	高技术产业技术选择指数	11.1767	4.6796	2.7483	31.0384	513
<i>TCI²</i>	工业技术选择指数	4.5155	2.4936	1.1756	12.4909	513
<i>Open</i>	贸易开放度	0.3405	0.42923	0.0316	2.3275	513
<i>Ragdp</i>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2036	1.0272	0.1527	6.2291	513
<i>Indus</i>	第二产业比重	0.4631	0.0770	0.1976	0.6150	513
<i>Tech</i>	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23.1234	46.2842	0.3279	384.2156	513
<i>lnTech</i>	高技术进步	4.9904	0.5843	3.5157	6.5846	513
<i>Nonsoe</i>	非国有经济占比	0.5287	0.2052	0.1012	0.9059	513
<i>Heavyindus</i>	工业重化程度	0.6665	0.1798	0.0020	1.7199	513
<i>Exbias</i>	出口中高技术产品占比	0.0683	0.0683	0.0002	0.4113	513
<i>lnExbias</i>	出口结构变动	-1.4174	0.5430	-3.6489	-0.3859	513

注:整理自199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二) 省级面板回归结果

我们构造回归方程(1)和(2),旨在考虑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这三大关键作用渠道的影响,同时控制技术进步和非国有化水平等因素。为考察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作用的具体机制,分别对其回归^③。

$$Laborsh_{it} = \alpha_i + \beta_1 Strategy_{it} + \beta_2 Open_{it} + \beta_3 Ragdp_{it} + \beta_4 Ragdp_{it}^2 + \beta_5 lnTech + \beta_6 Tech_{it} + \beta_7 Indus_{it} + \beta_8 Nonsoe_{it} + \beta_9 Exbias_{it} + \beta_{10} lnExbias_{it} + u_{it} \quad (1)$$

$$Capitalsh_{it} = \alpha_i + \beta_1 Strategy_{it} + \beta_2 Open_{it} + \beta_3 Ragdp_{it} + \beta_4 Ragdp_{it}^2 + \beta_5 lnTech + \beta_6 Tech_{it} + \beta_7 Indus_{it} + \beta_8 Nonsoe_{it} + \beta_9 Exbias_{it} + \beta_{10} lnExbias_{it} + u_{it} \quad (2)$$

以省区为单位对所有指标进行聚类分析下的 Hausman 检验,使用 TCI^1 、 TCI^2 分别得到 $\chi^2(10) = 56.98$ 及 $\chi^2(10) = 50.57$,远高于临界值 0.00,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面板回归应考虑各省的固定效应。

将 TCI^1 和 TCI^2 代入方程(1)、(2)进行回归,逐个剔除最不显著的变量,得到整体拟合较优的模型,表2、表3、表4报告了回归结果。

^①基于完整性和准确性考虑,未纳入西藏和青海的数据,且未将四川、重庆的数据加总为一个经济体纳入。

^② $Laborsh_{it}$ 和 $Capitalsh_{it}$ 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TCI^1_{it} 和 TCI^2_{it} 及其他数据由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③当然也可以将 $Laborsh/Capitalsh$ 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劳资分配差距的综合形成机制,回归结果本质上与表2、表3、表4一致。

表2 内外发展战略与要素收入份额:高技术产业技术选择指数(TCl^1)

变量	$Laborsh_{it}$	$Laborsh_{it}$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Strategy_{it}(TCl^1)$	-0.0015 (0.315)	-0.0018 (0.174)	0.0023 (0.106)	0.0023 (0.117)
$Open_{it}$	-0.0455** (0.043)	-0.0396* (0.056)	0.0493** (0.044)	0.0474** (0.040)
$Ragdp_{it}$	-0.0709*** (0.000)	-0.0712*** (0.000)	0.0401** (0.042)	0.0420** (0.050)
$Ragdp_{it}^2$	0.0087*** (0.000)	0.0088*** (0.001)	-0.0046 (0.136)	-0.0048 (0.143)
$Indus_{it}$	-0.5941*** (0.000)	-0.6018*** (0.000)	0.5318*** (0.000)	0.5411*** (0.000)
$Nonsoe_{it}$	-0.0213 (0.600)		0.0224 (0.582)	
$\ln Tech_{it}$	0.1092** (0.023)	0.0865** (0.016)	-0.0978* (0.074)	-0.0887** (0.035)
$Tech_{it}$	-0.0003** (0.032)	-0.0002** (0.024)	0.0003** (0.018)	0.0003*** (0.002)
$Exbias$	0.0294 (0.728)		-0.0052 (0.967)	
$\ln Exbias$	-0.0148 (0.445)		0.0027 (0.926)	
截距项	0.3147 (0.174)	0.4438*** (0.008)	0.5118* (0.074)	0.4700** (0.019)
corr(u_i, Xb)	-0.2043	-0.1166	-0.2159	-0.1750
相应的 F 检验	$F(10,26) = 33.73$	$F(7,26) = 44.51$	$F(10,26) = 18.59$	$F(7,26) = 25.77$
Within R^2	0.4712	0.4680	0.3592	0.3579

注:(1)圆括号内为所估计参数的p值或相应检验的F值;(2)*、**、***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表3 内外发展战略与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工业技术选择指数(TCl^2)

变量	$Laborsh_{it}$	$Laborsh_{it}$	$Laborsh_{it}$	$Laborsh_{it}$	$Laborsh_{it}$
$Strategy_{it}(TCl^2)$	-0.0143** (0.011)	-0.0173*** (0.001)	-0.0167*** (0.001)	-0.0147*** (0.000)	-0.0140*** (0.000)
$Open_{it}$	-0.0487** (0.044)	-0.0424* (0.059)	-0.0414* (0.061)	-0.0396* (0.067)	-0.0382* (0.061)
$Ragdp_{it}$	-0.0511*** (0.002)	-0.0454*** (0.002)	-0.0479*** (0.001)	-0.0550*** (0.001)	-0.0580*** (0.000)
$Ragdp_{it}^2$	0.0069*** (0.002)	0.0067*** (0.003)	0.0069*** (0.002)	0.0078*** (0.002)	0.0080*** (0.001)
$Indus_{it}$	-0.4651*** (0.001)	-0.4255*** (0.001)	-0.4309*** (0.001)	-0.4696*** (0.000)	-0.4657*** (0.000)
$Nonsoe_{it}$	-0.0557 (0.215)	-0.0492 (0.300)	-0.0481 (0.307)		
$\ln Tech_{it}$	0.0572 (0.231)				
$Tech_{it}$	-0.0002** (0.048)	-0.0001 (0.214)	-0.0001 (0.189)	-0.0001 (0.275)	
$Exbias$	0.0062 (0.947)				
$\ln Exbias$	-0.0173 (0.302)	-0.0108 (0.322)			
截距项	0.5592** (0.021)	0.8351*** (0.000)	0.8516*** (0.000)	0.8402*** (0.000)	0.8358*** (0.000)
corr(u_i, Xb)	-0.0604	-0.1879	-0.1361	-0.0394	0.0103
相应的 F 检验	$F(10,26) = 41.75$	$F(8,26) = 46.31$	$F(7,26) = 53.23$	$F(6,26) = 50.05$	$F(5,26) = 25.27$
Within R^2	0.4972	0.4924	0.4903	0.4862	0.4849

表4 内外发展战略与资本要素收入份额:工业技术选择指数(TCI^2)

变量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Capitalsh_{it}$
$Strategy_{it}(TCI^2)$	0.0153 ** (0.023)	0.0153 ** (0.023)	0.0154 ** (0.024)	0.0178 *** (0.001)	0.0157 *** (0.000)	0.0144 *** (0.000)
$Open_{it}$	0.0546 ** (0.042)	0.0561 ** (0.029)	0.0542 ** (0.033)	0.0503 ** (0.045)	0.0484 ** (0.047)	0.0457 ** (0.029)
$Ragdp_{it}$	0.0224 (0.225)	0.0232 (0.218)	0.0241 (0.201)	0.0191 (0.198)	0.0265 (0.115)	0.0326 ** (0.034)
$Ragdp_{it}^2$	-0.0031 (0.230)	-0.0032 (0.229)	-0.0034 (0.206)	-0.0031 (0.226)	-0.0040 (0.169)	-0.0045 * (0.100)
$Indus_{it}$	0.3931 *** (0.004)	0.3917 *** (0.004)	0.3883 *** (0.005)	0.3577 *** (0.006)	0.3981 *** (0.001)	0.3901 *** (0.001)
$Nonsoe_{it}$	0.0575 (0.221)	0.0566 (0.235)	0.0544 (0.248)	0.0501 (0.314)		
$\ln Tech_{it}$	-0.0527 (0.401)	-0.0517 (0.417)	-0.0408 (0.459)			
$Tech_{it}$	0.0003 ** (0.034)	0.0003 ** (0.011)	0.0003 *** (0.009)	0.0002 * (0.051)	0.0002 * (0.067)	
$Exbias_{it}$	0.0305 (0.822)					
$\ln Exbias_{it}$	0.0072 (0.799)	0.0095 (0.667)				
截距项	0.3105 (0.335)	0.3103 (0.337)	0.2450 (0.348)	0.0557 (0.261)	0.0675 (0.161)	0.0763 * (0.100)
$\text{corr}(u_i, Xb)$	-0.3169	-0.3119	-0.3021	-0.4206	-0.3308	-0.2286
相应的 F 检验	$F(10,26) = 17.98$	$F(9,26) = 21.35$	$F(8,26) = 23.45$	$F(7,26) = 21.30$	$F(6,26) = 23.79$	$F(5,26) = 18.75$
Within R^2	0.3910	0.3908	0.3891	0.3857	0.3802	0.3742

表2、表3、表4的结果表明对内对外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三类关键因素影响比较显著且符号符合预期。相较于高技术产业技术选择指数 TCI^1 , 工业技术选择指数 TCI^2 能提升模型整体拟合优度——方程(1)中 $\text{corr}(u_i, Xb)$ 的绝对值明显下降, 残差与自变量的相关性大大降低。此时 $Strategy$ 和 $Open$ 等变量更加显著, 影响也更大(系数绝对值更大)。这可能源于 TCI^2 采用的是产业增加值, 剔除了生产环节间的重复计算从而更能反映真实经济活动, 因此后续实证分析以 TCI^2 为主。

具体来看,“库兹涅茨”经济事实亦适合描述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从人均 GDP 及其平方项的系数符号可以看出,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基本呈 U 型、倒 U 型。产业结构指标 $Indus$ 系数显著说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经济活动对劳动份额有向下的作用。

使用 TCI^2 时高技术进步 $\ln Tech$ 对劳动份额、资本份额的解释不显著。高技术水平 $Tech$ 对资本份额始终保持正的显著影响, 高技术从业人数增加, 竟然提升资本份额而拉低劳动所得, 似乎表明中国高技术进步是资本增强型的, 高技术的引进伴随着资本对非熟练劳动的替代。 $Nonsoe$ 完全不显著, 不同于舆论的猜想——所有制改革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来源之一。^①

无论使用哪一个 TCI 指数, 赶超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对劳动份额影响均为负, 对资本份额影响均为正, 在理论预期之内。目前看来, SS 定理发挥作用的机制在要素市场势力的干扰下

^①在不纳入赶超战略因素时 $Nonsoe$ 显著, 说明所有制构成仅作为赶超战略的中间机制存在。

发生了扭曲。在控制技术选择偏向性的赶超战略后,贸易开放作用也十分显著,其对国内收入分配格局确实造成了影响。

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将工业重化指标 *Heavyindus* 作为赶超战略 *Strategy* 代入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三类关键机制保持了既有的显著性水平——国内外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仍然是最主要的作用渠道,且 *Strategy* 系数增大。^① 工业重化指标能够揭示赶超战略的产业导向,在于并非所有的国家及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会选择以重工业为依托,重化工业企业、大规模企业因为更容易征税而受到中国地方政府青睐 (Du, et al., 2013)。此外,使用变截距 (LSDV) 模型、两步回归等其他估计方法^②, 关键变量的符号保持一致,实证结论比较稳健。

(三) 结果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内对外政策方针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解决了国内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劳动收入份额不增反减,单位劳动收入水平之低可想而知。注重增长速度的资本技术偏向性赶超发展长期侵蚀着劳动报酬,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演进短期内亦对劳动收入份额带来下行压力。具体而言:

首先,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继续给劳动者报酬带来下行压力。过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加重了劳动力跨部门转移负担。进城务工农民绝大部分滞留为非熟练工人,工资整体停留在低水平。

其次,内外发展战略偏向增强使用资本技术,侵蚀了劳动报酬。中国实行资本技术增强型赶超战略,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各种优待全面干扰了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资本使用成本降低引致企业加大而非节约资本投入。而分配时则参照要素投入及边际产出,资本回报丰厚。非平衡发展思路下的城乡户籍分割使得国内“资强劳弱”格局日益固化。居民城镇化远落后于人口城镇化,城镇非户籍人口的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大量供给赋予厂商谈判优势 (张松林等,2014)。

再次,所有制改革和技术创新未能切实关注劳动者地位及利益改善。市场化改革和技术引进在赶超发展的作用下也偏向资本。国有企业改制,以及引进民营资本和外资时,由于我国企业产权制度不完善,劳动者产权普遍缺失或弱化,分配中资本所有者占主导 (梁泳梅, 2009); 赶超发展思路也能渗透影响技术发展方向和非国有资本的产业投向,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给以政策优惠,而忽视了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加剧资源错配。

南北贸易和发达国家间贸易显著促进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其效应甚至大于劳动禀赋结构的影响。国际贸易扩大本应使我国非熟练工人工资得到改善,但出口结构受国际产业链分工牵制,违背了经典贸易理论预期。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及 Stolper-Samuelson 定理讨论技术不变情形下,国际贸易经由产品价格均等化、要素价格均等化带来的要素收入变动。事实上,契合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的核心思想,要素禀赋作为供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张,理应带来非熟练劳动力需求扩大且边际报酬并不下降。而当代社会的国际分工打破了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的先进资本在全球寻找廉价的劳动要素,将产业链中

^① 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稳健性检验结果。

^② 感谢审稿人对此实证检验的建议,读者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有关的回归结果。

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其非熟练劳动力相结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强势地位。中国等后发国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进出口结构看似符合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为他人做嫁衣”。国际产业转移实则符合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和资源最优配置,提前植入其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非内生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抑制了劳动要素的市场地位改善。我国持续保有在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上的成本“优势”,极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无法向高端的生产设计环节上溯。一旦国际资本将加工出口产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地区和非洲,我国就会面临产业失势的危险。

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模式则进一步左右了技术选择及要素的议价能力。惯用的资源换资金方式,通过压低劳动、环境成本招商引资,所以即使出口扩张增加了劳动需求,劳动报酬并不必然上涨。在当前环境下,出口厂商及其他制造企业有进一步压低工资的动机。国内工业强农业弱、资本强劳动弱,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在劳动市场中地位非常强势,即使其愿意提供“高”工资吸引人才和熟练工人,也远远低于工人应得报酬。其他企业以此为支付标杆争相模仿,变相挤压劳动报酬,对劳动带来负向外溢效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并没有如期缩小中国的劳资分配差距、增进劳动者福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地位。在劳动需求扩张的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反映单位劳动报酬增速更大程度地落后于经济效率和资本报酬的增长。经济开放中劳动者受惠有限并不能说明“Stolper - Samuelson”定理在中国失灵。症结在于中国的扩大对外贸易和对内发展战略湮没了SS定理的效应,出口产品生产受国际资本牵制,技术选择更偏重资本,背离了要素禀赋内生的比较优势。

发展战略干扰了市场机制甚至使要素价格倒挂,加剧收入分配扭曲。中国应该沿着吸收劳动力、扩大就业的方向包容性发展,然而“拿来”的先进技术却偏向于资本。人为压低资本使用成本使得高技术发展进一步依赖于(即内嵌于, embedded in)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资强劳弱”格局进一步固化。

总之,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实现技术进步时应当更注重适宜合理的原则。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极易招致经济结构失衡和社会矛盾扩大,只有扭转这一趋势才能走上持久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轨道。改善劳动收入和劳动者地位不仅有利于居民收入倍增,消费潜力释放,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还关乎一代人的幸福和尊严问题。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不可避免,但最终会因为达到更高的经济水平而自行消解。关键在于改变求大求快的思维,注重各产业协调发展,破除制度藩篱,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最终让要素价格回归正常,推进技术进步沿着劳动增强型方向实现包容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2. 黄乾、魏下海,2010:《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4期。
3.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4. 梁泳梅,2009:《中国现阶段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差距的企业产权制度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 林浩、罗进强、郑岗,2005:《我国机电行业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北方经贸》第9期。
6. 林毅夫,2002:《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
7. 陆春平,2005:《中日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8. 钱学锋、陆丽娟、黄云湖、陈勇兵,2010:《中国的贸易条件真的持续恶化了吗?——基于种类变化的再估计》,《管理世界》第7期。
9. 邵敏、黄玖立,2010:《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9卷第4期。
10. 杨俊、廖尝君、邵汉华,2010:《经济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赶超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第8期。
11. 殷功利,2012:《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2012:《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11卷第2期。
13. 张乃丽、崔小秀,2009:《中国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变动分析》,《产业经济评论》第8卷第2辑。
14. 张全红,2010:《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财经科学》第6期。
15. 张松林、孙文远、程瑶,2014:《城乡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收入占比演变——兼论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成因》,《经济评论》第3期。
16.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2010:《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第10期。
17. Acemoglu, Daron. 2002.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9(4): 781 – 809.
18. Acemoglu, Daron. 2003. "Patterns of Skill Premi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199 – 230.
19. Anderson, Robert M., and Roberto C. Raimondo. 2008. "Equilibrium in Continuous – time Financial Markets; Endogenously Dynamically Complete Markets." *Econometrica*, 76(4): 841 – 907.
20. Bergsten, C. F. 200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nd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the Pacific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September 10. Available at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 ResearchID = 1291>.
21. Berman, E., J. Bound, and Z. Griliches. 1994. "Changes in the Demand for Skilled Labor within U. S. Manufacturing; Evidence from the Annual Survey of Manufactur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2): 367 – 397.
22. Borjas, G. J., R. B. Freeman, and L. F. Katz. 1997. "How Much Do Immigration and Trade Affect Labor Market Outcom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8(1): 1 – 90.
23. Cai, F., and Meiyang Wang. 2009. "Labor Cost Increase and Growth Pattern Transition." In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ume 1: The Approaching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ed. Fang Cai, 99 – 119. Leiden, Boston: Brill.
24. Du, Julian, Hongsheng Fang, and Xiangrong Jin. 2013.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Monetar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_2013.
25. Harrison, Ann E., Inessa Love, and Margaret S. McMillan. 2004. "Global Capital Flow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5(1): 269 – 301.
26. 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R. 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7. Katz, L. F., and K. M. Murphy. 1992.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 – 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1): 35 – 78.
28. Kris, James Mitchener, and Se Yan. 2014. "Globalization, Trade and Wages: What Does History Tell Us about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5(1): 131 – 168.
29. Krugman, Paul R. 1995.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6(1): 327 – 362.
30. Rodrik, Dani.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14(5): 1 – 19.
31. Rodrik, Dani. 2010.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2): 89 – 93.
32. Slaughter, Matthew, J. 2007. "Globalization and Declining Unio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46(2): 329 – 346.

Why Does China's Foreign Trade Strategy Count against Labor Incom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xception of Stolper – Samuelson Theorem in China

Li Zhuo and Li Zhijua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labor income in China couldn't catch up with the miracle of its national income growth, which took a smaller and smaller proportion in the 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Open – up policy, the expanding export scale stimulate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labor benefited little, which went against the expectation of factor endowme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was still concentrated on labor factor. This pap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net impact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labor income.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Catch – up Strategy, we construct and employ different indices to measure its degree, and still find that foreign trade biases towards capital rather than labor after controlling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structure are dominated by processing trade, which exploits and solidates the 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er pattern, as well as absorbs plenty of labor but suppresses its pay rise. If such situation goes on, China may be trapped by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uck in the low – end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derailed from the ascending channel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 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Open – up Policy; Catch – up Strategy; Capital – biased Policies

JEL Classification: O25, P33, P36

(责任编辑:孙永平)

(上接第 13 页)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Export Growth Momentum in New Normal Economy: An Analysis Based on Partial Year Effects of Enterprises

Du Weijian and Li Mengjie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Chinese Customs' monthly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mystery of export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artial year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tistical errors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new export enterprises' low export scale and high growth. Based on these studie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export growth momentum from two aspects – the export period and the export scale. After adjusting partial year effects, we get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new export enterprises have strong export growth momentum. Secondly, there is an inverted U –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growth and export scale, namely, the optimum scale of export enterprises does exist. However, few enterprises have reached the optimal scales in our sample. Therefore, the expansion of the export will benefit the long – term growth of enterprises. Lastly, the initial large export scale of enterprises will restrain export growth. In order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we respectively control the short – term impact on enterprises and make a cluster analysis, which validat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bove.

Key Words: Export Scale; Export Period; Export Growth Rate; Partial Year Effects; Tobit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D21, F14, M20

(责任编辑:彭爽)